



传承红色基因
讲好革命故事

开栏语

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，红色传统发扬好，红色基因传承好，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，血脉永续。在喜迎二十大召开之际，四平市委老干部局组织相关人员深入老红军子女、抗日老兵和参加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离休干部及部分优秀退休干部家中，进行访谈，挖掘珍藏在老干部心中难忘的红色记忆，发现并记录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动人故事，回顾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懈奋斗的革命经历。

本报从即日起推出《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革命故事》专栏，将连续报道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，抛头颅、洒热血的光辉岁月和老一辈建设者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的多彩人生。教育和引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史，增强政治意识、提高思想认识、强化责任担当，让红色精神内化于心，争做红色基因的传播者，让红色精神代代相承。



邹群(前排右一)在四平市担任领导时
在农村了解农业生产情况

豪情满怀革命志 红色基因代代传

——记老红军邹群的革命一生

邹晓京

我的父亲邹群，祖籍是江西省吉安县，一个叫小水的村庄。他出生在一个穷苦农民家庭，五岁时爷爷就去世了，奶奶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含辛茹苦地生活。奶奶为了让我父亲读书识字，不惜借债供他读了三年私塾。这为父亲参加革命从事机要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

1929年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父亲的家乡吉安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。父亲感受到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，是广大老百姓的靠山。他决心跟红军走，跟共产党走。他积极报名参加儿童团，站岗、放哨、查路条，后被推选为儿童团长。1930年，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第二年参加了红军。1932年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年仅16岁，是红军部队中年龄最小的战士和最年轻的中共党员。由于父亲上过三年学，是队伍里难得的有文化的人，所以被组织安排管文牍，并做了译电员。从此开启了父亲党的机要工作生涯。

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，父亲因队伍被打散而被俘。敌人见父亲当时年纪小，个子也小，就叫家乡人来做担保，释放回乡，所以没有跟上战略转移的大部队，留在了江西。不久，闻听留在江西的红军要组建新四军，父亲立马找到吉安新四军办事处，报到归队，并继续担任新四军吉安通讯处机要译电员。这次经历，是父亲面对革命遭受挫折后，作出的正确抉择，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周恩来副主席为组建新四军事宜，来到江西巡视工作，到吉安时要给中央发电报。父亲因只有三年文化对周副主席起草的电文中有些字不认识，于是忐忑不安地去请教周副主席，没想到周副主席是那样平易近人，耐心地一字一句念给我父亲，直到全部弄清楚。周副主席还详细询问了父亲的个人和家庭情况，鼓励他要学文化、学政治，要相信抗战一定会胜利，革命一定会

成功。这次和周副主席的交谈，使父亲终生难忘，更坚定了革命意志。

在日寇向南进攻中，新四军吉安通讯处撤回到军部，父亲在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做译电员，后被派往新一支队政治部机要股任股长。

1941年1月，新四军奉命北上抗日，在行军途中，遭遇国民党八万重兵包围，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九千新四军将士奋勇厮杀，浴血奋战与国民党军队激战七昼夜，弹尽粮绝。父亲所在新一支队接到军部的最后一封电报是：“自行突围，在苏南集结”。新一支队向西北突围，战斗到生死关头，父亲和战友们烧毁了密码本，拿起武器，誓与敌人血战到底，战斗一直打到凌晨。这时，山岗上突然飘来一层浓厚的云雾，遮盖了敌我阵地。支队首长抓住战机，即刻组织了一个司号队，对着敌人阵地吹起了冲锋号。号声惊天动地，吹得敌人魂飞胆丧。战士们群情激昂，杀声震天，直冲敌阵。国民党守军以为是新四军的增援部队到了，弃阵而逃。就这样，父亲所在新一支队三百余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他们经历了无数次险境，昼伏夜行，终于在苏南溧水县找到了地方党委。他们换上便装，渡过太湖，到达无锡地区新四军六师师部集结。

1945年，日本投降后，国共双方虽然签订了“双十停战协定”，但双方军事摩擦不断。于是在北平成立了由共产党、国民党和美国三方参加的“军事调处执行部”，专门调查处理军事纠纷事项。我方下设若干科组。工作人员是从解放区和各部队抽调的各类优秀人员，父亲也是从新四军调入代表团，担任机要科的译电员。当时延安生活很艰苦，他们便把每餐省下来的苹果集中起来。利用每周班机送回延安给战友们。随着形势不断恶化，国民党特务对代表团的监视也愈加厉害，有的同志甚至遭到了绑架。谈判破裂后，代表团大部分

同志先后撤回延安。只留少数人坚守岗位。父亲是唯一留下的机要员。

1947年3月2日，父亲跟随领导乘最后一架专机从北平撤回延安。由于父亲在北平军调部工作出色，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，得到领导的表扬。回到延安后，被组织调任做领导的机要秘书。后又担任过城市工作部机要科长。进北京后，任中央统战部机要科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由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的第一批政务院干部，父亲被任命为政务院秘书厅机要处副处长。

1956年3月，中央抽调大批干部支边，父亲带领国务院下派的80多名干部及家属，乘专列来到东北吉林省。父亲担任四平市的领导工作，一干就是23年。当时的四平市，战争创伤历历在目，街道很多都是土路，百废待兴。父亲积极投入到地方的经济建设中。他政治立场坚定，顾全大局，忠于职守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无私奉献，为四平市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1983年，父亲正式离休。虽然不在领导岗位上了，但他离岗不离党，积极参与创办了市老年书画协会和老年体育协会。他还为革命老区家乡的建设倾尽心血，捐资修桥铺路，并为希望小学出资购买了全部桌椅，结束了当地小学生上学自备桌椅的历史。

父亲在四平市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，他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光明磊落，真诚友善，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；他对下一代严格要求、精心培养，关心爱护，是一个好父亲，深受家庭成员的爱戴。

2011年5月7日，父亲去世了，享年96岁。他身上覆盖着党旗，在“十送红军”的乐曲歌声中与我们永远告别了。他安葬于四平市烈士陵园红军墓地。

父亲是为中国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革命者。我们缅怀老一辈革命家，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扬革命精神，传承红色基因，永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。

战争烽火

铸造不朽人生

——我的革命战争回忆录

董殿臣

我生于1927年，原籍山东省海阳县盘石镇北山后村。在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家里生活十分艰苦。我亲眼目睹日本侵华时，对家乡大扫荡，残害无辜百姓。九岁时，我加入儿童团，站岗放哨，参加抗战。1945年我在镇政府当通信员，1946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58年转业到地方，在四平市党政机关和政法系统工作，1988年离休。

回顾革命战争经历，那些在战场上无数次惊心动魄对敌作战的场景，仍历历在目。

1947年11月10日，解放战争期间，我在山东东海军分区独立团，接到上级命令攻打威海，并要求部队在次日早8时前抵达目的地。军情紧急，部队午后3点出发，开始了急行军，整个行军要在17个小时奔袭200里。行军路上，我没喝一口水，没吃一粒米，一刻不停地急行军，到达目的地时，全身都被汗水浸透，自己竟浑然不知，精疲力竭躺在水沟边上就睡着了。晚8点进入激烈攻坚战，一举打掉了国民党两个营兵力，国民党残余部队逃离威海，这场战役为解放威海打下了基础。1948年12月，威海战役打响，国民党军的一个团，在我军强大猛烈的攻势下，不到30分钟，便击溃了国民党守军，解放了威海。1949年的渡江战役，我军奉命进攻青岛，从平沽出发越过了大沽河，占领了承阳火车站。当进入到小隆山时，受到国民党守军狙击。激战中，我不幸身负重伤，鲜血染遍全身，我的胳膊、大腿、小腿多处受伤，后被送到医院进行手术。由于药品紧缺，我的手术是在无麻醉状态下进行的，当时我全靠坚强毅力和革命意志，硬是挺了过来。养伤2个月后，返回部队继续参战。至今在我的体内还残留着大小一百多块弹片，后来，我被鉴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。

渡江战役胜利后，朝鲜战争爆发，原部队改编为空军，我在炮兵连列编到东北四平坦克三师炮兵团。

1952年10月至1955年2月，我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，经历了残酷的朝鲜战争。金城反击战中我所在炮兵团隶属志愿军三打桥岩山，由于桥岩山是个制高点，占领这个点就能有力控制到20多里远的区域。桥岩山的工事在山洞中，地势易守难攻，两次攻打都没有成功。在第三次攻打时，战士们把手电筒捆绑在机枪上，进入敌阵地开始强攻，敌军以为志愿军用的什么新式武器，吓得慌忙逃脱，已无反击之力，最终一举攻破桥岩山。

桥岩山战役后，我被调到中线配合68军打金城，参加了奇袭白虎团的战役。白虎团配有1个机甲营，4个炮兵营和航空兵空中火力支援，也称首都师第一团。战斗中我们配合68军203团首先歼灭敌人炮兵群和白虎团团部，后直插北亭岭、下楼岭、梨实洞和上枫洞地区，坚守阵地狙击增援的敌人。此战，我军消灭了美军榴炮555营大部。这场战役大长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，震撼世界，体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敌、敢于拼搏的壮举，进一步证实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

首任梨树县委书记沈亚钢

单志

沈亚钢特别注重抓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，善于捕捉和发现蕴藏在职工群众中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物，并及时加以总结宣传，以此形成推动广大职工战胜困难、贡献聪明智慧，完成生产任务的强大精神力量。1960年八九月间，他从客车厂党委汇报中得知，铸车间女徒工邹淑琴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时时处处勤俭节约、精打细算，为工厂节约大量原材料和其他物资，成为“砂堆里飞出的金凤凰”，被誉为厂里红色管家人的先进事迹，沈亚钢觉得在她身上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。他亲自到工厂调查了解真实情况，并通过《长春日报社》指派记者进行采访，写出《邹淑琴——红色管家人》的长篇人物通讯，1960年11月、12月在《长春日报》头版头条套红发表。为扩大宣传效果，引起全市广大干部职工重视，沈亚钢以极大的政治热情，亲笔撰写社论《做个

好的共产主义接班人》，在同一天报纸见报，号召全市工人，尤其是广大青年要向邹淑琴学习，一个群众性的争当红色管家人的活动在长春市蓬勃地开展起来，职工群众的精神面貌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沈亚钢在长春的五年间，把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倾注在长春的工业发展上，使长春的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。

1961年3月奉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。1965年1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。这期间，他除了处理日常工作外，大部分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，从沈阳到本溪、抚顺、鞍山、吉林、哈尔滨、齐齐哈尔，几乎全东北的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，他亲自撰写既有实际情况分析，又有解决实际问题办法的调查报告，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很有价值的参考，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。（五）

在牺牲前，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表达他爱国忧民的情怀和坚贞不屈的信念：

寒窗未尽又铁窗，
国事家事两茫茫，
微身但愿殉国难，
岂计刑期几多长！

三、工人阶级的反日斗争
(一)四平街弹棉工人的罢工

1938年，日本资本集团运到四平街一大批皮棉，急需弹制成棉加工军用品。资本家强迫工人昼夜加班，但报酬甚微，加工1斤皮棉只给3分钱，引起弹棉工人的强烈不满。

农历五月初五，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，按习惯应改善伙食，但增顺洪

棉花工厂资本家连一顿饺子都没给工人吃，激起了工人的愤怒。于是，以付梦槐为首的几个工人秘密商议，决定在端午节后举行罢工，同时给奉天、南京、哈尔滨等地的棉花厂工人去信，约定联合罢工。

农历五月初七清早，40余名工人在付梦槐带领下，聚集在义积成棉花厂门前(制棉行业公会领头厂)，抗议增顺洪资方虐待工人，揭露端午不给工人改善伙食的事实，同时提出因物价上涨，生活困难，要求厂方将棉花加工费由1斤3分涨到6分钱。义积成资本家吴凤楼拒绝了工人的要求，增顺洪棉花厂工人首先宣布罢工，接着，三顺洪、义积成、义兴公等工厂的工人也先后举行罢工，四

平街制棉工人罢工总数达500余人。

哈尔滨道外十四制棉厂工人闻讯后，全厂320名工人以物价上涨生活困难为由立即宣布罢工，要求将工钱由生产每斤4分提高到7分，以此来支持四平街工人的行动。哈市其他制棉工人也相继罢工，很快，罢工浪潮波及东北几座城市。

日本人出动大批宪警、特务镇压，

四平街日伪警察头子佐佐木、田琦亲自出马，带领伪警察特务四处搜捕付梦槐等人。付梦槐被捕后，遭到严刑审讯，特务逼问他：“你们为什么要罢工？是不是共产党的头？”付梦槐等人坚定的回答：“柜上虐待我们，五月节不给工人饺子吃，工钱太少，生活困难，逼得我们工人不得不罢工。”

(未完待续)

